

# 文革時期的教育擴展

• 時磊、楊德才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一場空前的劫難，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毫無疑問，客觀評價文革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工作還有待進一步改進。本文試圖從可得數據與實證資料重新評估文革時期的教育發展情況，得出的結論是：這一時期中國的教育擴展十分迅速，至少可以從規模和數量角度這麼說。然後，我們通過理論和經濟史資料分析來解讀為甚麼在文革時期教育會有如此快速的增長。

## 一 人力資本嚴重損失，還是教育擴展？

2003年，蔡昉、都陽發表了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估算了文革時期人力資本積累受到的嚴重破壞。人力資本最重要的積累方式就是教育；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計算，當時的人力資本積累損失大概為14.3%<sup>①</sup>。這與我們的直觀印象頗為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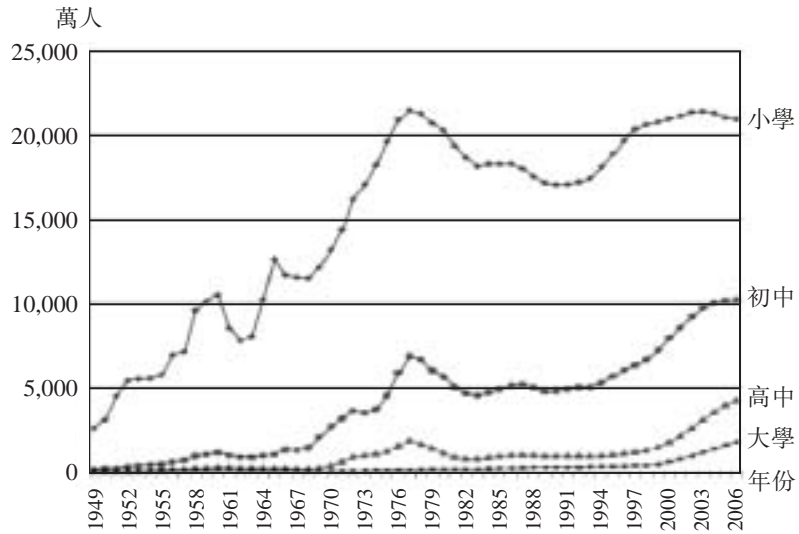
然而，我們發現，在文革中後期至文革結束後的一年（以下簡稱文革中後期），即1969至1977年，有一次規模較大的教育擴展，主要表現為中學和小學在校生的大幅度增長，相對而言，高等學校在校生的規模則很小且波動不大（圖1）。粗略地看，人力資本積累的估計損失數值將會大大下降，甚至還存在為負的可能<sup>②</sup>。從入學率的增長來看，情形也是如此。我們發現，文革時期入學率比之於文革前後都要高（表1），當然適齡人口的增長可能也是這次教育擴展的原因。

為甚麼在低收入水準下，適齡人口迅速增長非但沒有導致入學率下降，還有相當程度的上升？這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一般來說，經濟條件愈差、家庭規模愈大，子女受教育水準就會愈低<sup>③</sup>。根據這一預測，在人口高速增長、經濟條件沒有明顯改善的文革中後期，入學率理當下滑，教育發展理當滯後，但事實與之相左。

在文革中後期至文革結束後的一年，即1969至1977年，有一次規模較大的教育擴展，主要表現為中學和小學在校生的大幅度增長，高等學校在校生的規模則很小且波動不大。

\* 感謝高彥彥、李劍、張傑對本文的批評，當然文責自負。

圖1 新中國各類學校在校生人數 (1949-2006)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中經網統計數據庫，<http://db.cei.gov.cn>；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歷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表1 文革前後各類學校入學率的比較 (1952-1979)

年份	初中畢業生 高中入學率 (%)	小學畢業生 初中入學率 (%)	適齡兒童入學率 (%)
1952	168.6	96.0	49.2
1957	39.7	44.2	61.7
1962	30.0	45.3	56.1
1965	70.0	82.5	84.7
1970	38.6	71.2	/
1975	60.4	90.6	96.8
1978	40.9	87.7	95.5
1979	37.6	82.8	93.0

資料來源：《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頁100。

一般來說，經濟條件愈差、家庭規模愈大，子女受教育水準就會愈低。在人口高速增長、經濟條件沒有明顯改善的文革中後期，入學率理當下滑，教育發展理當滯後，但事實與之相左。

由於1957至1968年間制度結構、人均收入與文革中後期較為相似，我們以之作對比組。1957至1968年中學生在校生人數年均增長6.9%，其中高中生年均增長3.8%，初中生年均增長7.3%；而1969至1977年間，中學生在校生人數年均增長21.0%，其中高中生年均增長28.5%，初中生年均增長11.8%。小學生在校生人數1957至1968年間年均增長3.7%，1969至1977年間年均增長4.2%<sup>④</sup>。由此可見，文革中後期教育擴展是迅速的，比之其他時期明顯更快。

這一發現令人吃驚，大大背離一般的直覺。批評者可能會說，即使教育規模與數量擴張迅速，但這一時期由於教師受迫害、學制縮短、課程政治化，教育的品質可能大大下降<sup>⑤</sup>。首先，蔡昉、都陽並沒有考慮教育品質的因素，這至少說明從數量角度來看，我們可能誤解了文革時期的教育發展。其次，教育品

質評估是一個困難的問題，簡單地將常規課程的設置以及知識教育作為評價教育品質的標準是片面的。張俊森等認為，毛澤東時代強調實際經驗，讓大中小學生參與農業和工廠生產勞動，提高動手操作能力，未嘗不是一種良好的教育方式。他們利用雙胞胎資料估計「文革時期」與「非文革時期」的教育回報率，驚奇地發現「文革時期」的教育回報率竟然高於「非文革時期」<sup>⑥</sup>。

可以這樣設想，如果用教育回報率作指標，很難說文革時期的教育品質更差。理論上講，如果教育品質更高，同樣的受教育年數應該獲得更高的回報；教育回報率可以作為教育品質的一個近似測度，而且效果應該更加可靠。至於文革時期教育品質並不差的原因，張俊森等認為，雖然政治干預了正常的課程學習，許多教師受到迫害，學生必須積極地學習政治材料，並在農村和工廠參加生產勞動替代部分學校教育，但這種教育的潛在正向效應一直被忽略。他們認為，文革使得學生更加接近現實世界，這可能增進了他們的現實技能，並磨練了他們的意志，早年的經歷和艱難困苦可能對他們以後的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文革使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更有紀律，更有責任感，這些都抵消了知識方面的不足。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現有研究對文革教育的負面評價是不公正的，誤讀了這一時期教育的發展及其對後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當然，我們也不宜過度誇大對文革時期教育品質的正面評價，但客觀評價有利於我們反思當代的教育發展問題，特別是在動手操作能力、意志與精神培養方面的缺陷。文革時期教育發展規模增長迅速，但是在文革結束後，中小學在校生人數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sup>⑦</sup>。因此，討論這一時期的教育對我們理解教育發展問題有着重要的意義。特別在當下，農村學生輟學率居高不下<sup>⑧</sup>，教育發展狀況在很多地區遠不及文革時期，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也有利於我們反思當代的教育發展問題。

如果用教育回報率作指標，很難說文革時期的教育品質更差。理論上講，如果教育品質更高，同樣的受教育年數應該獲得更高的回報；教育回報率可以作為教育品質的一個近似測度，而且效果應該更加可靠。

## 二 為甚麼會出現教育擴展？

現有對教育擴展原因分析得最為深入的是人力資本理論。該理論認為教育屬於對技能和能力的智力投資，它會增加個體經濟生產能力，從而增加個體的經濟收入。對教育進行投資和對物質資本進行投資一樣，都是為了獲取回報。這樣，教育擴展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為人力資本投資能得到更高的收益率。這一理論為實證研究所證實，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sup>⑨</sup>。有學者發現，在美國，教育投資的收益率遠高於房產投資，而與機器設備廠房投資相當，且風險更小<sup>⑩</sup>。

但張俊森等認為，從教育投資中獲得豐碩報酬需要適宜的經濟政治環境。他們認為文革時期的經濟政治制度可能是不適宜的。他們利用1977年河北一個生產隊的資料估算發現，生產隊在分配勞動收入時從不獎勵大多數成員接受教育<sup>⑪</sup>。似乎從人力資本理論的角度很難理解文革中後期的教育發展。

趙耀輝是最早意識到在教育回報率很低的情況下教育也有可能擴展的經濟學者。她認為教育可以提高勞動者遷移的概率，尤其是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而遷移可以大大地提升經濟收入，從而間接地提高教育回報率。趙耀輝發現，教育可以通過影響找到工作的概率和提高在工作中的收入兩方面起作

用，而教育回報率估計的只是後者，不能估計出前者，所以就低估了教育的經濟收益<sup>⑳</sup>。

這一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文革中後期農村教育發展的某些方面。由於城市工資遠高於農村，那麼接受教育以提升在城市找到工作概率的激勵便主要集中在農村，這一時期的教育擴展將主要是由農村教育發展拉動的。但我們發現，這一時期教育擴展並不是由農村教育單方面增長所帶動的(表2)，城市和縣鎮的教育增長速度也十分迅速。顯然，我們需要開闢新的思路。

文革時期行政性分權導致計劃經濟「小型化」，產生了巨大的管理者崗位需求。管理者掌握資源的分配使用，可以獲得相對較高收入。要獲得這些崗位，受教育是必須的，所以就促進了教育快速發展。

本文試圖通過一個分析框架，結合上述趙耀輝的思路來解釋文革中後期的中國教育擴展。具體而言，文革時期行政性分權導致計劃經濟「小型化」，產生了巨大的管理者崗位需求。管理者掌握資源的分配使用，可以獲得相對較高收入。要獲得這些崗位，受教育是必須的，所以就促進了教育快速發展。而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大大降低了受教育的機會成本。

管理者和生產者的區別在大多經濟史研究中又稱「幹群差別」。武力承認計劃經濟體制產生了少數幹部享有經濟特權、脫離群眾、貪圖享受的官僚主義現象<sup>㉑</sup>。對於農村的幹群關係，黃宗智對長三角的研究發現，大隊領導每年可免除80%的生產勞動，而且掌握着經濟管理權、集體收入和財產的分配使用權，因此當大隊的幹部也是眾人企望，但大隊幹部必須有相當的文化水準<sup>㉒</sup>。

表2 中國學校在校生人數與城鄉結構(1971-1977)

單位：萬人

年份	城市 高中	縣鎮 高中	農村 高中	廠礦 高中	城市 初中	縣鎮 初中	農村 初中	廠礦 初中	城市 小學	縣鎮 小學	農村 小學	廠礦 小學
1971	126.4	91.5	344.9		483.2	201.5	1,063.1 (832.1)		1,219.0	608.4	9,397.3	
1972	228.0	155.4	474.6	52.4	565.3	254.6	1,904.6	165.5	1,224.8	703.5	10,621.0	519.6
1973	273.6	188.6	261.1	73.8	549.6	250.5	1,723.0	179.4	1,195.8	776.8	11,597.7	578.2
1974	322.8	199.1	480.8	94.0	551.2	283.1	1,813.3	193.1	1,124.7	804.4	12,552.3	614.7
1976	337.2	221.8	924.7	111.5	676.4	401.7	3,274.9	280.0	955.3	764.9	13,285.3	608.7
1977	353.6	256.7	1,189.7	127.9	701.8	420.0	3,858.2	315.2	915.1	737.4	12,965.1	611.7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71-1977年。引自人大經濟論壇，www.pinggu.org。

註：因1971年統計項目的不同，所以沒有廠礦辦學的相關資料，而括號內的資料為農村小學附屬中學班的在校生人數。1975年資料則沒有找到。

### 三 二元職業分割與教育在遷移中的作用

為了方便論述，我們將改革開放以前的體制依照慣例稱為「計劃體制」。本文將計劃體制下的工作分為兩種：一是生產活動，一是管理活動。由於計劃經濟的制度特性及發展中國家落後的技術水準，生產活動一般工作條件差、勞動報酬低；而管理活動則工作條件好，工作報酬高。這裏管理活動的報酬既包含實際分配的報酬，也包含隱性收入及其他收入。

由於計劃體制本身承擔大量的資訊負荷，它必須僱用大量的人員來處理資訊，做出決策，而且還要僱用人員來對資訊處理人員和決策人員進行監督和激

勵，然後又要對監督和激勵人員進行監督和激勵，這形成一個長長的資訊處理、監督、激勵的鏈條。這就使得計劃體制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官僚主義的特徵，而且這種官僚機構本身具有自我膨脹的內在衝動，因為機構膨脹會增加個體官僚偷懶的機會，而機構自己又不用承擔成本。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對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一個比較貼切的描述，其較為基本的模型是二元勞動力市場模型。二元勞動力市場模型以兩個市場為特徵，即高工資的一級市場 (primary market) 和低工資的二級市場 (secondary market)。由於這一模型一般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問題，我們這裏只是借用其基本思想。我們同樣將「好」的勞動力市場 (職業) 和「壞」的勞動力市場 (職業) 區分開來，「好」的職業收入高，「壞」的職業收入比較低，因而人們有從「壞」的職業加入「好」的職業的衝動和激勵。

二元勞動力市場模型一般認為兩個勞動力市場之間缺乏人員流動，本文認為，人員流動是可能的，但要附之一定的條件，就是教育。如果教育是從「壞」的職業加入「好」的職業的必要條件，那麼兩個職業工資的差距以及從「壞」職業加入「好」職業的概率便是影響人們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是要支付一定成本的，在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的「準福利機制」下，直接成本大都為政府承擔，那麼最重要的成本就是機會成本。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討論受教育的激勵：受教育可能性增加的原因是，由「壞」職業加入「好」職業的概率加大 (也就是加入「好」職業變得更加容易)、「壞」職業和「好」職業之間工資差距加大，以及受教育的機會成本下降。

但如武力研究，文革導致幹群差別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這一改變方向對教育擴展是不利的，所以我們主要論述的是遷移概率的加大及受教育機會成本的下降。下面我們就用經濟史資料結合二元勞動力市場模型的含義和趙耀輝的解釋，來討論文革中後期的教育擴展。

我們可以這樣討論受教育的激勵：受教育可能性增加的原因是，由「壞」職業加入「好」職業的概率加大，「壞」職業和「好」職業之間工資差距加大，以及受教育機會成本下降。

## 四 文革時期行政性分權與遷移概率的加大

為了交代文革與行政性分權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對新中國經濟史進行簡要的重新梳理。

### (一) 從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到文革的爆發

1949年新中國建立，共產黨政府繼承的是一個被戰爭破壞的經濟體制。從當時的知識水準與發展階段看，迅速引進在西方已經成熟並為蘇聯學習的現代社會分工體系，對於促進經濟發展是關鍵的<sup>⑤</sup>。1950年代，中國現代社會分工體系是在蘇聯和東歐的援助下完成的。由於這一社會分工水準不符合資源稟賦比較優勢並超越市場發展階段，因此中國必須採用非市場的手段使得社會生產資源流向有益於這一分工體系的方向。根據林毅夫等分析，這產生出一系列制度：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濟主體、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以及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sup>⑥</sup>。這種「三位一體」的制度是中國在不具備成熟交易制度的情況下，用來協

調從外部引進的現代社會分工體系的必然結果<sup>①</sup>。這一整套體制就是「計劃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體制將資源配置權集中於一小群計劃精英手中，來完成整個社會的資源調配。這種經濟體制和發展戰略的選擇，部分反映了當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中存在的一種看法，即蘇聯代表了一種現實的、也是相當成功的抉擇，以取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雖然中國領導人對蘇聯的成就持同樣的看法，但是從一開始，他們就對蘇聯經濟體制的許多特徵感到擔心。一些人對高度集中的計劃和管理體制的僵化表示擔心，而另外一些人則認識到，中國不能照搬蘇聯的模式，忽視農業。在某些方面，毛澤東以及那些與他關係密切的人，對蘇聯制度與日俱增的官僚化，對它重視與資本主義而不是與共產主義更一致的價值觀，感到頗為不解<sup>②</sup>。

1956年毛澤東就批評了計劃體制激勵不足的問題<sup>③</sup>，同時也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天然同盟軍——農民的利益在計劃體制中受到損害，認為這具有極大的政治風險<sup>④</sup>。1957年，中國政府做了一些減少過度集中的嘗試，措施是放鬆對某些私人市場的控制以及將一些決策權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機構。1958和1959年，出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樣的嘗試。1960年大躍進失敗後，又回到集中計劃上，同時加強市場作用、提高個人積極性，這主要體現在農業上，也在一定程度體現在小工業上。

對偏離蘇聯模式的嘗試蒙受失敗的原因，共產黨高層內部產生了巨大的分歧。毛澤東、林彪等人辯解說，大躍進的基本思想並非不正確，只是因為貫徹不力、時運不濟，以及蘇聯背信棄義，才導致了暫時的失敗。而另外一些領導人則認為，正是大躍進的觀念才是這場災難的主要根源。這時候，根據楊小凱的觀點，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派認為必須回到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路線上；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一派則認為必須摒棄蘇聯式路線。

毛澤東的社會建設理想，楊小凱認為是政治掛帥，群眾路線，各地自給自足，採用小型、本地生產技術，反對大型、現代、全面規劃的技術，反對專家路線。我們曾稱之為「毛澤東式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主義」。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認為這種經濟發展戰略與方式的根源是「延安模式」，即「經濟工作的分散經營和自力更生」。1957年開始的新的經濟模式探索，毛澤東所推崇的正是工業體系的區域化，這被稱之為「塊塊專政」<sup>⑤</sup>。麥克法夸爾和費正清指出，中共1966年以後所貫徹的政策，就是1950年代提出的、並在1960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同時加進了1958至1959年間大躍進方式的某些部分的政策。

正是原則上的分歧，再加上政治鬥爭，1966年開始，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手段，試圖摧毀自己為之付出很大的努力才建成的政權<sup>⑥</sup>。這場從1966年開始的政治風暴，幾乎摧毀了整個計劃經濟體制賴以生存的中央計劃機構。政治風暴之後的「小農社會主義」，有效地降低了社會分工水準與資源稟賦間的巨大差距，是中國由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向比較優勢戰略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轉變，但這種轉變長期以來一直為理論界所忽視。不過，「小農社會主義」並沒有擺脫計劃經濟的特質，資訊負荷只是由中央計劃當局轉移到了地方政府，這必然加速地方政府的膨脹，必然帶來官僚機構的擴張。

1950年代，中國現代社會分工體系是在蘇聯和東歐的援助下完成的。由於這一社會分工水準不符合資源稟賦比較優勢並超越市場發展階段，所以中國必須採用非市場的手段使得社會生產資源流向有益於這一分工體系的方向。

## (二) 行政性分權與遷移概率的加大

如前所述，在文革的混亂後，經濟發展戰略的思路是明確的，即「小農社會主義」。具體說，決策權力不斷下放，這在當代經濟史研究中被稱為「行政性分權」。自1970年開始中央向地方分權，與之相伴隨的是中央政府部門的撤併和國家財政、信貸和稅收的簡化<sup>②</sup>。文革對於中央計劃當局的破壞性打擊，導致計劃當局處理不了自己所承擔的資訊負荷時，最好的選擇就是將這一部分權力下放給其他計劃機構與層級。這種下放是不斷進行的，層層下放，形成了「小農社會主義」。

但是，權力的下放並沒有給予企業自主權，只是使得計劃經濟「小型化」，所以這種分權並不是經濟性分權，必然使得整個社會需要更多的基層計劃管理人員。因為總體資料不易得到，我們查閱了貴州省《桐梓縣志》，得知全縣國家行政幹部數量1965年為1,138人，而1970年為1,730人，1971年為2,889人，1972年為2,911人，1974年為3,405人，1976年為3,615人。從中可以管窺到當時基層計劃機構的迅速擴張。另一方面，決策權力的下放必然導致資源控制的下放，以及地方政府投資力度的加大，這表現為「小工業」投資與招工熱潮。1973年，桐梓縣內興辦「五小」工業和社隊工業企業240個，有小煤窯114個，鍋廠6個，硫磺廠13個，陶瓷廠6個，紙廠27個，農村水電佔72座<sup>③</sup>。由於沒有從業人員的資料，這只能間接地證明我們的結論。

這一時期城市招工人數也大幅度增長，主要見於基層的工業企業。例如，山東煙台造鎖總廠1949年後、改革開放前有三次招工，第一次是1958至1959年，招收265人；第二次是1971年，招收161人；第三次是1975至1977年，招收358人<sup>④</sup>。

根據前述趙耀輝的解釋，當進入城市工作的概率增加時，受教育的激勵就會被激發出來。計劃權力的下放必然使得下層計劃機構所掌握的資源增加，使得小工業的投資加大，企業的招工也就加速了，從而激發了對教育的激勵。

當進入城市工作的概率增加時，受教育的激勵就會被激發出來。計劃權力的下放必然使得下層計劃機構所掌握的資源增加，使得小工業的投資加大，企業的招工也就加速了，從而激發了對教育的激勵。

## 五 平均主義分配與受教育成本的下降

如前所述，受教育的成本主要為機會成本。在計劃經濟時代，教育的直接成本一般由國家福利承擔。在按勞分配體制下，若遵循嚴格的「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不得食」的原則，則受教育的機會成本會很大，特別是活在生存線附近的生活水準下的人。小孩如不接受教育，可以獲得一份勞動收入以改善家用，這可以理解為甚麼在19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以後，大量的中小學生輟學回家務農。而在計劃體制下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則使教育的機會成本下降。

計劃體制下的分配政策在城市表現為「八級工資制」，在農村則表現為「工分制」。「八級工資制」起始自1956年的工資改革，建立了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等幾大類分配制度。不同的系列採用不同的級別分類，級別與工資相對應。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間的比例，約為28：1。各系列之間可以互相換算，如文藝一級

相當於行政八級<sup>⑥</sup>。同時依據各地自然條件、物價等狀況，並適當照顧重點發展地區和生活條件艱苦地區，將全國分為11類工資區。工資區類別愈高，工資標準愈高。規定以1類地區為基準，每高一類，工資標準增加3%，如北京屬6類地區、西寧屬11類地區。

1956年工資改革剛剛完成，國務院很快發布指示：行政十級以上幹部全面降薪。降薪後，各級工資間的最大級差數，從28：1變成了25：1。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又兩度下令降低高級幹部工資。1960年又下令十七級以上黨員幹部降低工資標準。最高與最低工資標準之比為20：1。

對1956年的工資標準，毛澤東曾評論：「現在高級幹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懸殊是太大了……」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九評」中寫道：「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除薪金外，實際上還有特殊待遇的問題，如物資供應和警衛、住房等。為了抵制這種複雜化的官僚主義趨勢，毛澤東號召義務勞動、數次降低工資、下放幹部到農村開展「四清」<sup>⑦</sup>。

我們可以看到在文革之前，平均主義傾向已經抬頭。比之於市場經濟工資差距，趙德馨認為「八級工資制」間的差別其實微乎其微。關於「八級工資制」的企業資料，我們參閱了福建省情資料庫的《福建省志·煤炭工業志》，這一套標準從1959年4月開始執行，省屬企業、專區和縣屬企業分別執行不同的「八級工資制」。按規定，省屬企業最高級不得超過六級，專區和縣屬企業最高級不得超過五級。這樣井上人員最高月工資省屬企業為70元（六級），最低月工資收入為31元（一級）；專區和縣屬企業最高月工資為51元（五級），最低月工資為27元（一級）。1961年8月，新工人開始執行「五級工資制」，最高月工資和最低月工資分別為40元（五級）和24元（一級），收入差距大大縮小<sup>⑧</sup>。

「工分制」是計劃經濟時期農村落實按勞分配的具體措施。張江華這樣描述：糧食分配方式有兩種，一是口糧，即按照每家戶糧食消費能力所確定的糧食定額；另一種是工分糧，是按照工分多少來分配的糧食。口糧與工分糧的分配比例是所謂的「人七勞三」，即生產隊可供社員分配的糧食中，70%用作口糧分配，30%用作工分糧分配。但無論口糧還是工分糧，都會在年終決算中的家庭總工分值中抵扣，都是勞動所得。口糧的配給主要根據年齡來確定<sup>⑨</sup>。

從農業合作化之初起，各種各樣的「工分制」就已在各地廣泛展開。在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後，這一制度漸趨完善。具體說，即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以生產隊內的家戶為基本單位進行分配。生產隊會計用全年生產隊可分配的收入除以全年生產隊的總工分，得出單工分的價值。每個家戶全年總收入也就是由每家的總工分乘以該工分值。每一家戶全年總收入，減去家戶這一年在生產隊中的總支出，即得出該家戶該年的淨收入（或淨負債）<sup>⑩</sup>。高王凌的調查發現，糧食中有五成是按人頭均分的，而文革時期達到八成甚至更多<sup>⑪</sup>。

趙德馨認為，文革時期的左傾思潮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而是熱衷於限制微乎其微的個人收入差別。孫健指出，在文革中城市裏一再提廢除「八級工資制」，吃飯不要錢，反對生產責任制、反對按勞分配<sup>⑫</sup>。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也批評物質激勵、「利潤掛帥」，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復辟的

在計劃經濟時代，教育的直接成本一般由國家福利承擔。在按勞分配體制下，若遵循嚴格的「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不得食」的原則，受教育的機會成本會很大。



危險」。毛澤東在1974年指出，「八級工資制」是一個「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等級制」<sup>③</sup>。在農村，左傾思潮嚴厲地反對所謂的「工分掛帥」。在以糧食為主的實物分配中，「人頭糧」的分配更加抹平了農戶之間僅有一點工分數量差別。

很顯然，在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分配體制下，受教育的機會成本大大下降了。在城市，參加工作所能獲得的工資是非常低的；而在農村，口糧分配比例增加導致不參加生產勞動的成本大大降低。這樣教育的收益為個人所獨享，而教育的成本為社會或者集體所承擔，所以更多人願意去接受教育。結合上文分析，受教育進入「幹部」群體和成為工資收入更高的「工人」群體的概率加大，這一切導致了文革時期教育迅速擴展。

## 六 結論性評述

綜上所述，文革中後期中國經歷了異常迅速的中小學教育發展。幹部與群眾之間的收入差別，以及要成為幹部必須受教育，是使得教育發展成為可能的重要原因。在文革時期，由於行政性分權導致了幹部隊伍的大幅度擴張，同時小工業的發展使得招工人數大量增加，這些導致了勞動力遷移的概率大大增加，受教育的預期收益也隨之增長。與此同時，平均主義「大鍋飯」式的分配制度導致受教育的機會成本大大降低，二者共同促成了文革中後期的教育擴展。

在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分配體制下，在農村，口糧分配比例增加導致不參加生產勞動的成本大大降低。這樣教育的收益為個人所獨享，而教育的成本為社會或者集體所承擔，所以更多人願意去接受教育。

### 註釋

① 蔡昉、都陽：〈「文化大革命」對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破壞〉，《經濟學(季刊)》，2003年第4期，頁797-98。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② 需要說明的是，蔡昉、都陽的文章估算的是畢業生人數，而我們使用的是在校學生資料。我們研究過，在校生、招生數、畢業生人數在大體趨勢上都是一致的。

③ 孫志軍：〈農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決定因素——以赤峰農村地區為例〉，《中國人口科學》，2003年第2期，頁60-65。

④ 資料由筆者根據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相關資料整理、計算所得。

⑤ 董輔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⑥ Junsen Zhang, Pak-Wai Liu, and Linda Yu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China: Estimates Based on Twi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4, no. 2 (2007): 631-39。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⑦ Yaohui Zhao, "Labor Migration and Returns to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9, no. 4 (1997): 1278-87；高默波：〈書寫歷史：高家村〉，《讀書》，2001年第1期，頁9-16；張鳴：〈為甚麼會有農民懷念過去的集體化時代？〉，《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頁4-6。

⑧ 據教育部袁振國等人2005年的調查，農村中學的平均輟學率達到了可怕的43%。袁振國：〈縮小差距——中國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題〉，《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頁5-15。

⑨ George Psacharopoulos,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Global Update", *World Development* 22, no. 9 (1994): 1325-43。

- ⑩ Walter W. McMahon, "Relative Returns to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 in U.S. and Efficient Investment Strategie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10, no. 4 (1991): 283-96.
- ⑪ Tianyou Li and Junsen Zhang, "Return to Education under Collective and Household Farming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6, no. 2 (1998): 307-35.
- ⑫ Yaohui Zhao, "Labor Migration and Returns to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1278-87。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 ⑬ 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 ⑭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0)。
- ⑮ 楊小凱：《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引自搜狐財經，2004年10月21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41021/n222632877.shtml>。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 ⑯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迹：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⑰ 時磊、楊德才：〈專業化分工、制度引進與新中國經濟增長〉，《經濟研究資訊》，2006年第8期，頁3-14。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 ⑱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俞金堯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 ⑲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 ⑳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 ㉑ Yingyi Qian, Gérard Roland, and Chenggang Xu, "Why is China Different from Eastern Europe? Perspectives from Organization Theo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 no. 4-6 (1998): 1085-94.
- ㉒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 ㉓ 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67-1984》(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 ㉔ 桐梓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桐梓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頁915、426。
- ㉕ 山東煙台造鎖總廠志辦公室編：《山東煙台造鎖總廠志》(北京：華齡出版社，1993)，頁122。
- ㉖ 關於文革以前的工資改革資料，來自黃新原：〈1956年的定級〉，《人民政協報》，2004年10月28日。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 ㉗㉘ 楊奎松：〈毛澤東為何對「職務等級工資制」不滿〉，《同舟共進》，2007年第10期，頁47；48。
- ㉙ 資料來自福建省情資料庫，[www.fjsq.gov.cn/query\\_b.asp?bookno=40&class IP=0&](http://www.fjsq.gov.cn/query_b.asp?bookno=40&class IP=0&)。
- ㉚ 張江華：〈工分制下農戶的經濟行為——對恰亞諾夫假說的驗證與補充〉，《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6期，頁95-110。
- ㉛ 張江華：〈工分制下的勞動激勵與集體行動的效率〉，《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5期，頁1-20。
- ㉜ 高王凌：《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 ㉝ 孫健：《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90年代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後文引用不再另註。

時 磊 揚州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楊德才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